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乡俗小说

XIANGSHU XIAOSHUO

魯 彥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鲁 彦
乡俗小说

曾华鹏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施浩祥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华均绥

鲁彦 乡俗小说

曾华鹏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上海艺文激光电脑排版厂排版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75 插页 5 字数 120,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321-1281-0/I·993 定价:7.80 元

序

曾华鹏

“五四”时代风暴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了一个群星灿烂的辉煌时期。王鲁彦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从1923年发表小说处女作《秋夜》起到1944年在贫病交加中逝世,他辛苦笔耕二十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独具特色的文学创作和富有文采的翻译文字。仅小说创作就出版了《柚子》、《黄金》、《童年的悲哀》、《小小的心》、《屋顶下》、《雀鼠集》、《河边》、《伤兵旅馆》、《我们的喇叭》九个短篇小说集和中篇小说《乡下》、长篇小说《野火》。王鲁彦长期过着流浪生活,人生道路十分坎坷,这为他的创作积累了异常丰富的素材。因而他的小说对中国社会生活能作广泛的描写,都市和乡村中许多阶层人物的生活和命运都在他的笔下得

到多姿多彩的再现。《乡下》、《野火》等中篇小说对农村阶级对立和农民自发抗争的精细描绘,《陈老奶》、《千家村》等短篇小说对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艰苦环境中所表现的乐观情绪和坚毅态度的热情赞颂,都生动地表明其作者把握重大题材的本领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因而在王鲁彦的创作历程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作品发表以后在读者中曾产生较大的影响,并理所当然地受到现代文学研究者的重视。

然而在王鲁彦的全部小说创作中,最有特色最具魅力的还是那些描写故乡浙东农村乡镇生活的作品。这位青年作家步入文坛不久,茅盾就在一篇评论中说:“王鲁彦的短篇小说,到现在似乎也不过十多篇……在这中间,我最喜欢,并且认为思想技术都好的,只有两篇:《许是不至于罢》和《黄金》。”并且预言,如果作者能继续“用他的锐敏的感觉去描写乡村小资产阶级,把他的 CANVAS 扩展开来,那么,一定还有更好的成绩。”(《王鲁彦论》)在此后的文学生涯中,王鲁彦沿着《黄金》等作品所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进,他从故乡生活中采撷题材,奉献出一系列忆述故乡事情和抒写作者乡愁的小说佳构,这些作品赢得广大读者的喜爱。他没有辜负茅盾的期望,终于以自己优异的创作成绩而成为现代乡土文学流派的一位出色的作家。

乡土文学流派是形成于二十年代的一个在现代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的文学创作群体,它以在作品里描写故乡生活题材、渲染浓郁乡土气息为其共同的流派特征。而在众多乡

土文学派的作家中，王鲁彦又是具有异常鲜明的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色彩的。这主要表现在他往往能够在反映故乡生活题材的作品里同时展示给读者一幅幅特定地域的丰富多采的风俗图画。

王鲁彦小说世界里所展现的大量乡风民俗，为人们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审美领域，读者从那扑面而来的艺术氛围中获得了艺术的愉悦，艺术的享受。那么，王鲁彦在他的小说里是从哪些方面来展开风土人情的描写，作品里浓郁的民俗乡风的艺术氛围是怎样形成的呢？翻开王鲁彦的小说，我们可以看到，他总是将摄像镜头不断变换各种视角对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并且运用各种具体描写和多种艺术色调来描绘与渲染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的独特气氛。

王鲁彦小说里的地名和人物称谓颇具特色。在他笔下的村庄大多以姓氏命名，如袁家村、吴家村、薛家村、易家村、陈四桥、朱家桥；而村民之间则多以亲属相称呼，如本德婆婆、如史伯伯、吉生伯母、伊新叔、阿芝婶、阿成哥、阿长嫂、阿林侄……等。这种地名与称谓的习惯，保留着封建宗法社会以家族为聚居群落和以血缘为人际纽带的遗风，同时也反映了浙东农村的一种特有的社会习尚。

王鲁彦小说里还较多描写浙东农村的某些婚丧习俗。《许是不至于罢》展示了民间婚娶的种种礼仪：诸如婚期将近时的送贺礼，吉日前一晚的“杀猪饭”，结婚当天五更新郎的拜祖先，早上的“享先饭”，奏乐声中的中午“正席”，以及

在三个大纸炮和无数鞭炮的响声中迎花轿进门等等，都有生动的叙写。《阿长贼骨头》则详细描写了农村殓丧的某些场景。读者可以看到收殓者是怎样在呼喊“黄金十二两”“乌金十二两”“白米三斗”的应答声中敲着铜锣将死人入殓的。《菊英的出嫁》里的“冥婚”，描写死了十年的少男少女还像活在人世一样地嫁娶，举行着隆重盛大的婚礼仪式，这更是浙东特有的民间风俗。事实表明，一个地区的风俗习惯往往充分表现在婚丧礼仪中，较多描写婚娶和丧葬的种种礼仪和仪式，无疑能够加浓作品的民俗色彩。

王鲁彦小说里还大量叙写浙东农村长期流传着的各种陈规习俗、风尚礼节、宗教仪式、心理信仰。如《岔路》里的村庄之间的械斗；《河边》里的烧香拜佛、求签问卦的宗教活动；《鼠牙》写到浙江永康地区老鼠嫁女的民间风俗；《屋顶下》的女主人公因中秋节打碎羹匙而大惊失色，是带有迷信色彩的忌讳；《黄金》里的“梦粪染身，主得黄金”，梦见棺材即可升官发财，则是根据浙东的民俗对梦兆的解释。至于《阿长贼骨头》里描写盗墓贼在行窃时的各种规矩和咒语，更是作品里颇为引人入胜的精彩片断。王鲁彦小说里这种大量的民俗风情的描写，不仅能够渲染一种独特的情调与氛围，大大增强作品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使这些小说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很高的民俗学的价值。

当然，王鲁彦在小说里大量描写特定地域的民俗风情，决不是单纯为了制造某种异域情调或追求某些表面的艺术

效果；作品里的风俗描写也没有游离于所反映的社会内容而单独存在。相反，王鲁彦小说的民俗描写是与社会生活的反映、人物形象的塑造、思想主题的表现以及艺术风格的形成紧密相联系的。在这方面他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艺术经验。

首先，王鲁彦将描写民俗风情和反映社会生活、揭示社会矛盾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作品里描绘出既有浓郁地域色彩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中国农村的生活图画。他的短篇乡俗小说里展示出旧中国农村各种各样的矛盾冲突。既有不同宗族的村民的武斗，也有同一行业的老板的竞争，既有乡亲邻里的矛盾，也有母子婆媳的冲突。虽然作品里没有正面反映农村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它所揭示的这些矛盾冲突，同样也是特定时代农村现实生活的重要内容，是构成农村社会的若干侧面。同时，这些农村日常生活的矛盾冲突又往往是伴随着特定地域的风俗习惯表现出来的，因而它又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

旧中国农村的落后与愚昧在王鲁彦小说的风俗描写中也得到具体而生动的展现。《岔路》写的是农村械斗的陋俗。袁家村和吴家村同时遭受到鼠疫的威胁，无数生命被毁灭，许多家庭被破坏，村民们在恐怖与绝望中依照本地习俗抬着关爷的神像出巡，他们虔诚礼拜，盛大游行，企望以此来消灾灭祸、驱逐瘟神。可是在迎神赛会的盛举中，村民们却先为哪个村长当正总管而吵闹，继而又为游行队伍先走哪

个村而争执,并由此导致一场极残酷的武斗:“真正的械斗开始了。两村的人都擦亮了储藏着的刀和枪,堆起了矮墙和土垒,子弹在空中呼啸着”。这样的结果是天灾加上人祸,“每个村庄里的人在加倍的死亡”。这篇小说通过迎神和械斗等民俗的描写,具体地表现了封建迷信思想和封建宗法思想是怎样将遭受灾难威胁的农民推向更加巨大的苦难的深渊。《菊英的出嫁》写的是冥婚的风俗。菊英八岁就死了,她的母亲却相信人死后仍然能像活人一样的生长,因而经过十年,她认为女儿已经十八岁了,已到了结婚的年龄,就要为她找一个也是死去多年而年纪相当的男子为丈夫,于是媒人说合、送聘金、办嫁妆等都一丝不苟地进行,出嫁时候更有盛大的仪仗:披着红绦的送嫂,写着红字的灯笼,热闹的旗子和鼓吹;只不过陪嫁婢仆、铺陈和器具都是纸制品,花轿是青色的,轿后还有沉重的灵柩。这是异常奇特的婚姻礼仪,所体现的是一种死后生存的原始信仰。在《岔路》和《菊英的出嫁》这两篇小说里,风俗描写都成为情节构成的主体,而作品所展示的迎神、械斗、冥婚,都是旧中国农村的落后、愚昧的形象写照。

然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东南沿海的农村毕竟已经不是全封闭的了,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开始侵蚀着闭塞的乡村,并给它带来深刻的变化。这种时代的新动向在王鲁彦的短篇乡俗小说里也得到一定的反映。《桥上》写米店老板伊新叔与永泰米行老板林吉康的同行竞争。伊新叔采用的人

工春米的落后方式敌不过林吉康机械化的轧米船的冲击，他终于被迫破产。《许是不至于罢》和《黄金》里所展示的主人公和他们的乡亲邻里的关系，已不同于以往农村中那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天然首长的封建羁绊已不复存在，温情脉脉的面纱亦已撕破，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是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无论是资本主义式的自由竞争，或是人际关系的新变化，王鲁彦小说在浓郁的民俗风情描写中敏锐地传达出现代工业文明侵蚀下中国农村历史变动的某些新信息。

其次，王鲁彦将描写民俗风情和刻画人物形象结合起来，让人物在乡风民俗的氛围中活动，而乡风民俗则在人物的活动中得到绚丽多彩的显现。组成王鲁彦乡俗小说人物画廊的有众多形象：雇工、农村流浪汉、小有产者、商人、小财主、村长、农家妇女等，这些形象在作者笔下都被描写得栩栩如生、各呈异彩。尤其可贵的是，王鲁彦描绘人物形象时总是努力将他的艺术解剖刀伸向人物的心灵世界，准确而细致地剖视人物的社会心理，从而达到从较深层面上刻画人物的效果。

王鲁彦善于揭示长期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在某些人物性格中留下的烙印。他笔下某些人物的处世哲学时常蕴含着本色中国人的天经地义的人生观念。《屋顶下》的本德婆婆走过“一碗咸菜，一碟盐，养大儿子，赎回屋子”的人生历程，

为了创建这个家而劳苦一生，她认为只有熬到儿子成家立业才达到人生目的，“倘若能够抱到孙子，更是她无边的福了”，因此她小心翼翼地驾着家庭之舟朝着她的人生目标行驶。经验向她证明：“当家有如把舵，要精明，要懂得人情世故，要刻苦，要做得体面。一个不小心，触到暗礁，便会闯下大祸，弄得家破人亡的。”让她整天提心吊胆的是家庭之舟会不会倾覆。她的接班人当家媳妇阿芝婶对她十分孝顺，常买些新鲜菜来孝敬她，然而本德婆婆认定这样“乱花钱”是有导致败家的危险的，婆媳由此产生矛盾。中秋节这天媳妇不小心跌碎一只汤匙，本德婆婆感到大祸临头：“偏偏要在今天打碎东西！你想败我一家吗？”于是在这个小小的屋顶下爆发了一场你死我活的剧烈冲突。在这里，带有迷信色彩的忌讳习俗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线，又是刻画人物性格的重要一笔。《许是不至于罢》里那个为三儿办婚事而忙碌的财主王阿虞认为人生在世，“丁旺，财旺，是最要紧的事情”，他为拥有二十万家产而得意，面对着四个儿子他又认真推算，按照一比四继续繁衍，他将会有16个孙子，64个曾孙，256个玄孙，想到这里他“脑中涌出无边的满足”。《桥上》的伊新叔的人生哲学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个米店老板吃咸菜，穿布衣，不嗜烟酒，这样省吃俭用，“年轻的时候是为的祖宗，好让人家说说，某人有一个好的儿孙，年纪大了，是为的自己的儿孙，好让他们将来过一些舒服的日子”，子女嫁娶后，“他把自己的寿穴也造了起来”。无论是本德婆婆对家庭

本位的全力维护,王阿虞的子孙满堂的梦想,还是伊新叔对人生责任的理解与实践,这些带有浓厚宗法意识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都显示出长期封建社会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的痕迹。我们认为,王鲁彦注意表现人物的这种社会心理状态,既是对人物形象的深层刻画,同时也是一种更深广的民俗风情的揭示与展露。

王鲁彦还善于捕捉并描写社会变动中各种人物的心理变化以及各自呈现的不同心态。茅盾曾经说过:“王鲁彦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在我看来,是一些乡村的小资产阶级,例如《黄金》里的主人公,和《许是不至于罢》里的王阿虞财主”,这些人物“多少已经感受着外来工业文明的波动”,在他们身上所表现的,“似乎正是工业文明打碎了乡村经济时应有的人们的心理状况”(《王鲁彦论》)。《许是不至于罢》是在1924年江浙军阀战争的背景下叙写财主王阿虞娶儿媳的故事。由于社会动乱,王阿虞生怕强盗拦截花轿抢走新娘,处处小心谨慎,他让儿媳的嫁妆事先秘密运来,婚礼当天还对花轿进行伪装,在热闹的猜拳行令的婚宴上他忧心忡忡,表现出百般惊慌。作品在浓厚的民俗氛围中极其生动地描写了王阿虞的紧张心理。婚事办完不久,小偷半夜光顾王阿虞家,虽然敲起慌乱锣声,但自私的邻居却都不管他,待到第二天才假惺惺地前来慰问;财主明知是空头人情也还再三向众人道谢。在乡村的人与人之间只存在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时,兵慌马乱的时势使有钱的财主连邻居也不敢

得罪，还以“他们现在并不来破坏我”为满足。正如茅盾所说“财产成了他的负罪的记号，使他不得不格外谦虚了。”（《王鲁彦论》）《黄金》里的如史伯伯由于在外的儿子没能按时寄钱回来而受到陈四桥人们的种种歧视，甚至在村邻的酒席上这位昔日德高望重的长者也被故意安排在下位而受到奚落与羞辱。在这里，封建尊长原则已经动摇，金钱成为是否受尊敬的价值标准。如史伯伯夫妇企望能摆脱这种尴尬的地位，但他们这种愿望只能在梦中实现：如史伯母先是以梦见棺材为吉兆，再又为“梦粪染身，主得黄金”而欢欣，而如史伯伯也在绝望中梦见儿子寄来汇款与黄金。三个梦以及按当地风俗对梦兆的解释，成为农村中冷酷的人际关系中小有产者心理状态的生动写照。此外，《桥上》的伊新叔在与林吉康轧米船竞争并由此走向破产的过程中也表现出从自信、恐慌到绝望的内心变化。《屋顶下》的阿芝婶终于孤傲地走出家门，带着她的憧憬走向城市，渴望在新的天地里“自己创一份家业”。总之，王阿虞在村邻面前的谦虚，如史伯伯夫妇接二连三的好梦，伊新叔在竞争中的复杂思绪，阿芝婶对城市的向往，这一切都真实地表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侵蚀农村并打乱原有生活秩序后所带来的乡村各阶层人们的心理变化，王鲁彦在浓郁的乡风民俗氛围中揭示人物这种内心深处的颤动，这同样也是对人物形象的深层面的刻画。

再次，王鲁彦将描写民俗风情和表现作家对故乡的相思、对生活的评价结合起来。他的乡俗小说所描叙的都是渗

透着故乡风俗人情的社会生活，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度过自己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土表现出十分矛盾的感情态度。他十八岁离开家乡，从此“就踏入了紧张的生活的战场，尝尽了许许多多的滋味，看见了各色各样的人，遇到了各色各样的事”（《关于我的创作》）；他既经历过无数辛劳与艰苦，也接受现代文明与科学的洗礼，当他在苦难境遇中回忆往事时，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乡生活情景能够给他受伤的心灵带来些微的慰藉，些许的温馨，然而当他以现代文明与科学的思想来观照故乡的社会现实，也就是从新的思想高度来返观生他养他的土地时，故乡的封闭与落后又会引起他的忧虑与焦急。王鲁彦这种矛盾的感情态度也是众多乡土文学家所共有的特征。

王鲁彦乡俗小说这种既有亲切眷恋又有深刻批判的感情色彩，在不同的作品里是呈现出各异的形态的。在有些小说里，批判的份量占有较大的比重。例如《自立》这篇小说描写两个堂兄弟的一场官司，堂弟因嫉妒堂哥有钱，就以堂哥一句戏谑的话为借口同他打官司，同时串通县官，官司打到堂哥九十九亩田输完为止。弟兄内心相互怨恨，表面却仍然“兄弟怡怡”，甚至在一道去县里受堂审的路上还争着为对方付三文钱的渡船费。官司的结果两败俱伤，“袋袋装得饱饱的是县官”。在这篇近似民间故事的作品里，封建伦理的虚伪和封建官僚的贪婪受到尖锐的批判。《鼠牙》写的是同宗妯娌间的纠纷。阿长嫂和阿德嫂都发现放在共用的谷仓

里的谷子减少,都怀疑被对方所偷,后来弄清原来是被群鼠偷吃。从此两家都为将鼠害嫁予对方而要弄出许多花招,从而生发出许多纠葛。他们或诱杀对方的猫,或凌迟捕到的老鼠来指桑骂槐,最后都按地方风俗在老鼠嫁女的日子提供食物,熄灯敛声,以便让老鼠浩浩荡荡嫁到对方去。王鲁彦在这篇作品里对主人公们的自私愚昧与庸俗无聊予以辛辣的讽刺与无情的鞭挞。王鲁彦也有一些小说是以眷恋为主调的,《童年的悲哀》是这类作品的优秀代表。农村中的雇工阿成哥是一个“多才而又多艺的粗人”,他将童年时代的“我”带引进音乐的天地,让“我”在由歌声琴声构筑的美的世界里享受到欢乐与幸福;但是这位能干聪慧的年轻劳动者却突然死于非命。“从此我失去了阿成哥,也失去一切……”心灵深处遗留下的只有永远无法抹去的童年的悲哀。在这篇作品里荡漾着的是对故乡童年生活的微带哀愁的深情的忆念。当然,在王鲁彦的多数乡俗小说里,亲切的眷恋与深刻的批判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受到瘟疫死亡威胁着的村民却还在相互残杀(《岔路》);在贫困、冷酷的处境中做着黄金梦(《黄金》);以愚昧的冥婚方式表达对女儿的情爱(《菊英的出嫁》);在求签问卦的迷信活动中寄托对儿子的关怀(《河边》);为将贫困之神拒之门外而采取严酷的家长专制(《屋顶下》);对一个偷窃、盗棺的农村流浪汉的祝福(《阿长贼骨头》),在这些生活故事里,作者的同情中有批判,批判中有同情,在这种同情与批判的感情交织中完成作

品思想主题的表现。而王鲁彦风俗描写的这一系列特色也成为构建他的小说独特艺术风格的重要因素。

1994年4月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以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